

原價\$95
特價\$75

興盛與危機

論中國社會超穩定結構

1992年增訂本

金觀濤 劉青峰 著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專刊(十二)

興 盛 與 危 機

論 中 國 社 會 超 穩 定 結 構

1992年增訂本

金觀濤 劉青峰 著



中文大學出版社

© 香港中文大學 1992

本書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所有。除獲香港中文大學書面允許外，不得在任何地區，以任何方式，任何文字翻印、仿製或轉載本書文字或圖表。

封面攝影：王苗

國際統一書號（ISBN）：962-201-541-7

出版：中文大學出版社

香港中文大學・香港 新界 沙田

承印：美力（柯式）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黃竹坑道好景工業大廈

The Cycle of Growth and Decline—

On the Ultrastable Structure of Chinese Society (in Chinese)

By Jin Guantao and Liu Qingfeng

©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92

All Rights Reserved.

ISBN: 962-201-541-7

Published b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Shatin, N.T., Hong Kong

Printed in Hong Kong

增訂本序言

在《興盛與危機》(增訂本)即將出版之際，我們回想這本書的寫作、出版經過，不禁感慨萬千。也許，這一過程恰好可以反映出作者的思考及其所處的時代變局的關係。

二十年前，我們剛從北京大學畢業，時值文化革命後期封建法西斯主義高壓統治，我們開始了對中國社會結構的思考。約在1974年前後，寫出了四萬字的研究提綱，運用中國封建社會的超穩定結構假說，檢視中國帝制時代社會結構的周期性振蕩及其巨大穩定性的聯繫，並且還討論到文革現象。1979年春，思想解放運動的浪潮捲起之初，我們在紀念「五四」60週年的座談會上，提出中國封建社會長期延續原因的超穩定系統假說，發言引起了人們的關注和興趣。1980年初，《貴陽師範學院學報》第一、第二期連載了我們的長篇論文，論文只討論到1840年前中國帝制時代社會結構。

1980年9月，一位素不相識的女編輯闖到我們六平方米的小辦公室，自我介紹說：「我叫胡凡，湖南人民出版社的編輯。」她請我們把《貴陽師範學院學報》上的論文，寫成一本專著。當時，我們藉藉無名，出版社憑甚麼相信兩位從未寫過專書的作者？「你們寫吧，」她口氣十分肯定，「你們的觀點和方法對史學界是一個大突破，應該鼓勵學術上的創見。作為一個編輯，一生能出幾本好書，就是最大的滿足。」我們答應放下其他工作，一年交稿。

1981年9月，我們如期完稿。但書的出版是1984年4月。當初，胡凡告訴我們，湖南人民出版社出書周期為三個月，1982年初可出版。事實上，拖了兩年多。因為，在1981年的反資產階級自由化和1983年的清除精神污染兩次整肅中，我們的超穩定系統假說均遭到批判，被指為發結構主義史學在中國的濫觴，非馬克思主義的異端。在這頂政治性大帽子下，胡凡所承受的壓力可想而知。但她說：「我這個人就是有一股犟脾氣。」憑着這股犟脾氣，她據理力爭，從下到上，從上

到下，不知折騰了多少回合。我們擔心這會對她的處境不利，要撤回書稿，她也不肯。1984年，《興盛與危機》終於出版時，前面加了個「出版說明」。海外讀者可能不明白，既然任何學術著作都有探索性，爲甚麼要加上這種此地無銀三百兩式的說明呢？事實上，絕大多數書籍前也都没有「出版說明」。其實，這是出版社的自我保護辦法，萬一有關方面怪罪下來，可以有個交待。

《興盛與危機》出版於一個全民族歷史性反思的關頭，它立即受到讀者和學術界的重視：國內三次加印，香港銷路暢順；1986年，谷風出版社出版了台灣版，1987年日本研文出版社出版了簡寫本日文版。1986年我們到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訪問研究一年，其間寫了〈論歷史研究的整體方法〉，說明我們研究方法與馬克思主義派、帕森思結構功能派等不同學派的異同。1989年台灣風雲時代出版公司將《興盛與危機》連同這篇發表於《知識分子》(紐約，1987年)的論文和其他評介文章，一起出版，並冠以「修訂本」的名義。其實，該版本的內容和文字均保持了湖南版原樣。現在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才是我們大幅度修訂過的修訂版。爲了區別於風雲時代出版公司的「修訂本」，我們將本書稱爲增訂本。

增訂本在中大出版，也有一段曲折。

1987年我們訪美一年回國。我們這時已閱讀了不少有關文獻，這是1980年寫作書稿時所不可能讀到的；同時也看到一些對《興盛與危機》的評論。這時，胡凡又找到我們，她仍不減當年的熱情和堅定，一意請求我們修訂《興盛與危機》。她自己因爲出版這本書和其他事情，已從湖南人民出版社調往江蘇人民出版社，因此增訂本決定在南京出版。我們於1988年投入修訂工作。1989年4月初應邀到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訪問時，我們正在看增訂本的清樣。4月中旬，胡耀邦先生去世，由此引發的學運迅猛展開。4月底，我們回北京參加「五四」70週年的學術會議，5月中旬回港。半個月後，發生了震驚世界的「六四」事件，尚未付印的《興盛與危機》增訂本也就因此而擱淺了，一擱就是兩年。前不久，我們的朋友中國文化研究所所長陳方正先生去和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社長詹德隆先生商議，結果決定由中文

大學出版社出版這本書。在此，我們衷心地感謝陳、詹二先生的支持。俗話說，好事多磨。也許，一本企圖在理論上創新的著作，不僅構思寫作要經過十餘年磨練，就是它的出版過程，也要經過風風雨雨的考驗。

下面，我們再談談增訂本與原著的不同之處。

首先，《興盛與危機》是引進新方法研究中國傳統社會的宏觀結構的一個嘗試，而我們在1980年寫作書稿時對海外社會科學理論所知甚少，只能本着控制論、系統論的基本概念，提出我們的理論假說，並試圖建立一般性理論架構，這就是原書第九章〈社會結構與文明演化〉。在修訂過程中，我們着力重寫了這一章，改名為〈社會結構演化理論〉(本書第十章)。該章分析了我們的觀點與結構功能派的不同，特別是與其靜態觀的不同，力圖從社會組織方式和演變的角度，說明不同文明的不同社會形態及演化模式。對原先提出的概念和方法，我們也作出了較精確的定義和說明。

第二，增訂本新加了〈科學技術與古代社會〉一章。1980年我們寫作《興盛與危機》時，忽略了古代科學技術與社會發展的關係。李約瑟曾提出著名的「李約瑟問題」。70年代，馬克·艾文(Mark Elvin)提出高水平陷阱說，從人口、土地、古代科技發展水平的相互關係，來探討中國封建社會的停滯性問題。我們曾與樊洪業合作，於1982—1983年作出有關中國古代科技發展與社會結構的研究。因此，現在新寫的這一章(本書第九章)，探討了「李約瑟問題」與超穩定系統假說之間的關係，增加了研究的整體性。

第三，《興盛與危機》出版幾年來，曾引起廣泛的討論。這本書曾受到非學術的政治性指責，也有海外學者提出學術性批評。對於前者，我們的態度是不去理會。然而，至今我們還從沒有對學術性的批評作出回應。我們認為，嚴肅的學術批評和討論是以邏輯和事實去驗證假說是否成立。這種認真而又嚴峻的坦誠相見，是探索和追求真理所必須經過的步驟。因此，我們這一增訂本的目的在於：用近年來我們所了解的海內外有關研究成果，對我們的假說作一次較全面的檢驗。這也可以說是我們對批評的一種回應。

如何使增訂本既能反映這一檢驗過程，又保持清晰簡潔的風格呢？除了對原文做必要的改正和少量補充外，我們主要採用注釋方式，即把印證或挑戰我們觀點的材料和研究，以及一些說明性的材料，用【】號標出，放到各章後面的注釋中。

除了上述說到的新寫的第九、第十章之外，增訂本對原著第一章和第八章也做出較大的修改。第一章對全書提出的中心問題——中國封建社會長期延續原因及所使用的概念，給出了較明確的界定。第八章是討論中國封建社會意識形態的，正如有些學者所指出的，這一章比較薄弱。增訂本雖然沒有改變原書觀點，但吸收了某些海外港台學者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見解，以使我們的表述較為準確。

經過上述修訂，現增訂本比原著增加了八萬字。無論是在我們加注，或新增，或改寫，或重寫的章節中，都包含了我們對一些批評意見的非辯駁性的回答。增訂本中保留了原著的序言和後記，以表示我們對曾經幫助和支持寫作本書的朋友們，特別是對包遵信先生的懷念和感謝。

我們這一個遲來的增訂本肯定會有這樣或那樣的不足，甚至可能會帶進新問題。但我們希望它能取代現在市面流行的原有版本。因為這一增訂本代表了我們目前對中國傳統社會結構的觀點，也是我們以此為基礎的進一步研究——中國近現代社會結構宏觀演變過程——的起點。

金觀濤 劉青峰

1991年8月於香港中文大學
中國文化研究所

史學領域的新探索

包遵信

還是三年前，一次偶然的機會，我在一位朋友那兒讀到一篇論文打印稿。它就是現在這本論著的雛型：《中國封建社會的結構：一個超穩定系統》。當時給我一個突出的印象，就是它有股迷人的魅力；進而對作者這種大膽的探索，表示由衷的嘆賞。與那篇論文相比，現在這本《興盛與危機》份量已多了好幾倍，但讀了它，依然會使你耳目一新。

一部學術論著，我說它「迷人」，是否有點不倫不類？其實，科學上任何創新的價值固然是在它能給人更真切的知識，但它最先打動人的往往是讓人領略到一種美的快感。美學上有所謂「以美引真」的說法，我的這種感受是否就是這個道理？這部論著從結論到方法，都是以往一些史學論著未曾道及的。對於像我這樣一個雖與史學有緣而又沒有入門的人，讀了以後有種聞所未聞的新奇感，這不是很自然的嗎？

值得慶幸的是，事實已經遠遠超出了我的這種感受。現在史學界圍繞中國封建社會長期延續的原因，正在熱烈地爭論着。這場爭論的引發點，就是作者那篇論文的發表，把這個非常困惑人的老問題向人們重新提了出來。與二十年代末和五十年代初的兩次討論相比，目前的討論中已有不少論述把這個問題的探討大大向前推進了一步。他們不再滿足於引經據典，而是放開了視野，從歷史整體的宏觀角度來對這一問題進行探討。雖然這還只是一個初露的勢頭，卻也非常令人可喜，而這一特點在這本論著中則是最為突出的。作者充分吸取了前人和時賢研究的成果，運用現代科學的方法，對這一問題提出了一個嶄新的看法：中國封建社會是個超穩定系統，這就是它能長期延續的原因。作為一種學術觀點，對「超穩定系統」這個說法，當然只能褒貶隨

人，可以繼續討論。但作者這種從歷史整體觀上解剖中國封建社會的內部結構，從經濟、政治和思想文化幾個方面的交互影響和互為因果的歷史變化中進行綜合的探索，這同那些單純從某個局部、某個方面去尋究歷史演變的終極原因相比，在方法論上不能不說是個長處。

說到方法論，就使人想到我們的歷史研究，許多問題，許多人物，在我們史學家的筆下，時而肯定，時而否定，總是在兩個極端之間搖擺。雖則肯定或否定都有它們一定的道理，但人們不免狐疑：難道歷史研究的目的僅限於此嗎？何況這種肯定或否定雖是截然對立，但從方法論上探究，它們往往又都是從同一原則出發的。歷史科學是研究社會發展過程的客觀規律的。現在有些被稱為中國歷史發展「規律」的，很難說和歷史唯物主義教本中講的有甚麼兩樣。歷史研究中這種原理化傾向，非但沒有給理論增添甚麼光彩，反而使一部分人喪失了對理論的信心。現在有些同志埋頭於史料的整理和考據，而不屑於歷史發展規律的探索，多少也是對這種傾向的反抗。雖然這樣做並不能真正克服這種傾向，但空喊重視理論也同樣於事無補的。理論本身也應該發展，研究方法更需要改進。

目前我們的歷史研究主要還是局限於描述和議論的方法，對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往往滿足於作一些定性的判斷。定量分析和比較研究，不過時隱時現地在歷史科學的大門之外徘徊，更不用說有意識地採用現代科學的方法和手段了。難怪有人說我們的歷史科學還停留在古典科學的時代哩！可怕的倒不是我們目前暫時落後的現狀，而是滿足於這種現狀，維護這種現狀。現在這本論著的出版，能不能給這個現狀打開一個缺口？至少它是第一次將現代自然科學的方法引進了中國歷史研究的領域，並從實踐上為我們作出了非常有益的嘗試。這件事的意義恐怕要遠在它的結論之上。

作者在這本論著中運用了控制論、系統論和數學模型的方法。我完全相信作者說的，這些方法並不像有些人想像的那麼神祕。不過目前不少同志對它們都還是相當生疏的。我就是這樣的一個。面對這種狀況怎麼辦？抵制它，用一頂「西方資產階級貨色」的大帽子堵住它？

這是我們相當熟悉，也是屢試屢敗的老辦法。魯迅有篇隨感錄，題目叫做〈來了〉。大意是說中國人遇事總是不問虛實，不究底蘊，只要聽見有人說「來了」「來了」，就都聞風而逃，最終難免上當。它的用意是在揭露當時社會上普遍存在的盲從和自大。盲從造就對已有事物的迷信；自大助長了對新鮮事物的抵觸。我們曾經不止一次吃過這種盲從和自大的苦頭。雖然健忘也是某些人的特性，但對大多數人來說，恐怕誰也不願再來充當一次現代堂·詰訶德式的英雄罷。

當然，歷史唯物主義是我們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的理論基礎。現代科學方法，包括控制論、系統論，它們只能豐富歷史唯物主義，並不能代替歷史唯物主義。歷史研究中引用現代科學方法，這同堅持歷史唯物主義是一致的。在這方面進行探索的同志，也不曾有超越歷史唯物主義這種不切實際的奢念。這本論著就是一個最有力的證據。令人費解的倒是，恰恰那些一提現代科學方法就搖頭的同志，卻總要在現代科學方法和歷史唯物主義之間劃分一條不可逾越的鴻溝，把它們截然對立起來。如果有誰向前跨越一步，他們就驚慌不已，斥之為「標新立異」，甚而乾脆就給扣上一頂「資產階級思想」的大帽子，好像現代科學知識、科學方法，只是褻瀆他們聖潔靈魂的污水。如果這也叫做堅持馬克思主義，那恕我不敬，那只不過是患了一種神經衰弱的思想貧乏症。他們的虔誠雖然令人起敬，他們的表現卻與馬克思主義精神背道而馳。既然我們堅信馬克思主義，那就應當懂得，馬克思主義是最富有生命力的學說。它能擷取人類歷史上一切優秀的文化遺產，當然更能兼容當代科學中那些珍貴成果，不管這些成果是由誰創造的。這在原則上難道還容懷疑嗎？問題在於我們這些自信是馬克思主義者的人，是否有這樣的心胸、眼光和魄力。誠然，在歷史研究中吸收、運用現代科學方法時，會遇到歷史唯物主義同它們如何結合的問題。這確是一個理論上有待探索的新課題。這本論著雖然沒有正面回答這個問題，但它的出版不是為我們探索這個新課題提供了一個很有說服力的實例嗎？

我不懂控制論，對於歷史研究怎樣運用現代科學方法，也沒有從

理論上研究過，但我讀了這本論著卻不覺得隔膜。它在你面前展現的那些歷史場面彷彿讓你身臨其境，可以說就是一個一個活的社會，因而給你一種強烈的歷史感；它對許多問題的分析，層次分明，給人一種清晰感，不會使你如霧中看花，似懂非懂。有些問題，譬如中國歷史上的農民起義和農民戰爭，次數之多，規模之大，都是世界罕見的，可是為甚麼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只有政權易姓的改朝換代，卻從來不曾有過一次真正的社會革命？說法當然還是有的，那就是農民階級不代表新的生產方式，那時農民起義沒有先進的階級領導等等。誠然，這是農民階級歷史的和階級的局限，理論上是無懈可擊的。只是這種解釋如同說古人沒有宇宙飛船所以不能登上月球一樣，雖則千真萬確，難免流於空泛，所以與其說它是甚麼歷史規律，還不如說是歷史唯物主義的常識。況且它又怎樣與另一個理論，即只有農民起義和農民戰爭的階級鬥爭才是推動歷史前進的動力相一致呢？正像作者講的，我們的歷史研究往往就這樣陷入了一張難以擺脫的因果循環論的大網。如果我們把中國封建社會看作是一個「超穩定系統」，這對正確理解這一問題或許更有啟發意義。

長期以來，在我們的觀念和實際中，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之間，總是橫亘着一道不可逾越的鴻溝，現在該是填平這道鴻溝的時候了。隨着現代科學的發展，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一體化已成為不可抗拒的歷史趨勢，社會科學正在朝着同自然科學結合的方向邁步。在這一學術思潮中，我們卻遲遲沒有起步，比起其他某些學科（如經濟學），中國史研究的大門，好像還不曾有現代科學來叩問過。現在這本論著的出版，能否當作代表史學領域這一新潮的初現？我以為是可以的。

1816年黑格爾在海德堡大學講壇上，開始他的哲學史講演之前，曾有一段意味深長的話：「我們老一輩的人是從時代的暴風雨中長成的，我們應該讚美諸君的幸福，因為你們的青春正是落在這樣一些日子裏，你們可以不受擾亂地專心從事於真理和科學的探討。」我深信我們學術界的諸位前輩，要遠比這位西方哲學老人更有氣度，更能寬容，獎掖後進的熱誠會和時代前進的步伐成正比。我和本書的兩位作

者是同輩人，只是他們都不是專門從事歷史研究的；這本論著也只是帶有探索性的嘗試，這樣或那樣的缺點當然難免。行家裏手如果有嚴肅的批評，那也是完全應該，非常有益的。但願不要因其還有斑疵，就不屑一顧；倘是囿於見聞，斥之為怪，那就不足為取了。

1982年春節於北京東郊新源里



金觀濤、劉青峰是中國當代著名學者，曾合作和分別出版《問題方法集》、《我的哲學探索》、《讓科學的光芒照亮自己》、《新十日談》等有關哲學、中西社會文化及科學史研究著作十餘種。

《興盛與危機》是金觀濤、劉青峰的代表作。作者大膽地將系統論整體研究方法運用到歷史研究中，從中國

封建社會延續兩千餘年與每兩三百年爆發一次大動亂之間的關係入手分析，提出中國社會是一個超穩定系統的假說，並用這一套模式去解釋中國社會、文化兩千年來的宏觀結構變遷及其基本特點。由於本書觀點在中國產生很大的影響，在海內外學術界也普遍受到關注，一般認為是中國十年改革時期重新詮釋中國歷史的最重要理論著作之一。本書是作者近年廣泛吸收歷史學和社會科學最新研究成果後，對 1984 年初版作大量修訂後的增訂本，比原書增加了八萬多字，討論超穩定說和著名的李約瑟問題之間的關係。增訂本不僅對近幾年超穩定說引起的爭議和評論作出回答，也對全書的方法論基礎加以更嚴格的論述。

本書簡潔生動，行文流暢，不只適合歷史學、社會學和文化研究的學者及大學生閱讀，對一般讀者來說也是不可多得的讀物。

國際統一書號 (ISBN) 962-201-541-7

PRINTED IN HONG KONG



中文大學出版社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目 錄

增訂本序言	vii
史學領域的新探索	包遵信 xi
第一章 一個古老的難題	1
1.1 對思考的再思考	1
1.2 以往學說的疑難	2
1.3 問題的正確提法	6
1.4 社會結構及周期性、停滯性	9
第二章 中國封建社會的結構	19
2.1 「大一統」之謎	19
2.2 兩個生動的比喻：「馬鈴薯」與「混凝土」	21
2.3 儒生、官僚及語言、通訊工具	24
2.4 郡縣制、儒家國家學說及一體化結構	28
2.5 封建大國的自發分裂傾向	32
2.6 一體化功能之一：對分封制的調節	34
2.7 一體化功能之二：限制人身依附關係	37
2.8 一體化功能之三：抑制軍事割據	38
2.9 兩種不同結構的封建社會	41
2.10 一對同構體：家庭與國家組織	44
2.11 中國封建社會結構的脆性	49
2.12 維持脆性的平衡——強控制	50
2.13 繁榮與陰影	53

第三章 無組織力量及社會結構的老化	63
3.1 歷史病：官僚機構及人員的膨脹和腐化	63
3.2 封建特權與低薪制	67
3.3 皇帝的調節作用與權力金字塔	72
3.4 皇權的放大：宦官、外戚干政	76
3.5 其麼是無組織力量	80
3.6 經濟結構中的無組織力量：土地兼併	82
3.7 土地兼併的自發趨勢和受控階段	86
3.8 危機爆發的突然性	90
3.9 無組織力量的匯流	92
3.10 王朝威信(天命)的喪失	96
第四章 變法與動亂	105
4.1 變法效果遞減律	105
4.2 王朝中後期變法對社會危機的加劇	108
4.3 封建剝削的可控部分與不可控部分	111
4.4 剝削放大效應	115
4.5 農民大起義與社會結構的關係	118
4.6 動亂規模與無組織力量成正比	121
第五章 中國封建王朝的修復機制	131
5.1 奇異的修復能力	131
5.2 大動亂的調節作用	132
5.3 新王朝穩定性與無組織力量殘存程度成反比	135
5.4 第一塊修復模板：宗法同構體	139
5.5 皇權主義：農民對第一塊模板的意識	141
5.6 第二塊修復模板：一體化目標	143
5.7 兩塊模板的拼合：新王朝建立的三種途徑	146
5.8 與一體化不相容力量的淘汰	150
第六章 歷史的奇觀：超穩定系統	157
6.1 從一個寓言談起	157

6.2 資本主義萌芽成長的障礙之一：強控制和郡縣城市	161
6.3 資本主義因素結合的障礙之二：缺乏中介	165
6.4 原始積累的中斷	170
6.5 封建王朝崩潰前的「假資本主義」	174
6.6 脆性瓦解的悲劇	180
6.7 嚴峻的選擇	184
6.8 永恒的萌芽	187
6.9 中國封建社會的超穩定結構	196
第七章 魏晉南北朝亞穩態結構及其他	203
7.1 一體化調節的失靈	203
7.2 中原的虛弱和少數民族內遷	204
7.3 玄學、佛教的興起	207
7.4 政治結構的變化：分裂、貴族化及九品中正制	211
7.5 經濟結構的變化：塢堡組織和人身依附關係的加強	214
7.6 亞穩結構與魏晉封建說	218
7.7 重建一體化的道路	220
7.8 南朝的貢獻與死胡同	221
7.9 中華民族大熔爐	224
7.10 超穩定系統對外來衝擊的反應	227
7.11 中國社會超穩定系統形成發展的階段	234
第八章 意識形態結構的系統分析	239
8.1 如何分析意識形態的結構	239
8.2 儒家、墨家、道家的結構	242
8.3 意識形態結構的內和諧	250
8.4 一體化對意識形態的要求	252
8.5 內和諧、外適應與意識形態結構的演化	255
8.6 儒家和道家的互補結構	260
8.7 衝擊、反芻和融合	266
8.8 理學的僵化與反僵化鬥爭	270
8.9 價值觀反省	274

第九章 科學技術與古代社會	277
9.1 李約瑟問題	277
9.2 蒸汽機革命和一步之差之困惑	281
9.3 科學技術史研究的整體觀	285
9.4 近代科學技術結構：在西方社會結構演變中成長	288
9.5 中國古代「大一統」技術結構	291
9.6 陰陽觀念和直觀外推的思想方式	296
9.7 倫理中心主義對科學的影響	298
9.8 社會結構對科學技術進步的容量	300
第十章 社會結構演化理論	309
10.1 「整體分析」方法	309
10.2 社會結構的三個子系統	314
10.3 形態組合和社會結構調節原理	320
10.4 結構穩定性和脆性	327
10.5 從存在到演化：潛結構的形成	332
10.6 功能耦合系統的破壞：結構老化和無組織力量的增長	336
10.7 社會結構演化的四種模式	343
10.8 社會行動的新理論	348
第十一章 數學模型和王朝壽命研究	359
11.1 歷史學家與數學家的合作	359
11.2 從事件到數軸的映射：尋找主要變量	360
11.3 王朝穩定性的數學表示	362
11.4 行為曲面與盛衰曲線	364
11.5 王朝盛衰方程	368
11.6 王朝壽命討論及其他推論	370
後 記	377